

光 照 河 浜

——回忆伯父曹法孟

曹 铁 山

伯父曹法孟，长垣县武邱乡三合村人。一九三三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曾先后担任当时属于河北省的东明县河西区组织委员、区长等职。一九四〇年八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家乡附近的黄河滩上。

一九一〇年，伯父出生于东明的黄河西岸，系中农家庭。幼年时，即因身高力大，且能够团结伙伴，成为本村的“小孩王”。他在本村上私塾时，酷爱读书，喜听故事，对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书中的人物情节特别感兴趣。这些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散着嫉恶如仇的种籽。一次，大人们议论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一事，他就慷慨陈词：“真理是歪曲不了的！人民是欺骗不了的！”从此乡亲们赞扬他为“小先生”、“洋学生”。

一九二七年，伯父在仅读四年私塾之后，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濮阳三贤思高小读书。并在这个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。当时在校任教的关老师是附近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，他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，读了一些革命书籍，逐渐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道理，为以后投身于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一九三〇年，伯父毕业还乡，遂被乡亲们公举为三合村村长。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，土豪劣绅和土匪横行乡里，敲诈勒索，鱼肉人民；加之黄河水连年泛滥成灾，滩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为确保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他发动群众，建立了大刀会，并献出自家的院落作为大刀会的会场。他亲自训练大刀会会员，并宣传革命思想。他说：“咱们成立大刀会，一能锻炼身体，二能保家自卫，抵御外患。”自此，伯父成了三合村的核心人物，赢得了乡亲们的拥护和爱戴，为后来建立革命组织，开展革命工作奠定了群众基础。

一九三三年，共产党员张建廷、江鸿楚，以种地为名来到三合村秘密开展党的工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和直接交往，他们发现伯父的思想进步，群众基础好，有领导才能，于是介绍伯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胸怀大志，愿救人民于水火的伯父终于投入了党的怀抱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同年，在张建廷、江鸿楚两位同志的倡导和帮助下，伯父与本村共产党员王化山在我三合村组织了“粪叉子队”（即后来的“穷人会”）。“粪叉子队”是穷人的组织，共产党组织的前身。宗旨是为穷人办事。队纳规定：凡正直勇敢、能吃苦耐劳的贫民都可参加，参加者须交纳入队费一个铜钱，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，会址设在王化山家中（今曹东善家）。作为“粪叉子队”首領的伯父，经常召开会议，进行宣传工 作，积极发展队员，扩大队伍，并组织队员学习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等文章。他还介绍外地农民运动的经验。一九三三年冬，“粪叉子队”准备搞农民暴动，建立农民武装。由于国民党加紧清党清乡，大搞白色恐

怖，致使暴动未能发起。次年“粪叉子队”转入地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，到一九三六年发展到一百多人。还正式向队员宣布：“粪叉子队”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，要与官府富户和土匪斗争到底。

伯父一方面在地下秘密开展党的工作，同时以公开的村长身份，有理、有利、有节地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。一九三四年，伪乡长李志粉以复堤为名，搜刮民财，贪污自用。伯父得知后，义愤填膺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他发动群众，登门找李，揭露其罪恶事实，进行说理斗争。李志粉不但不认罪，反而以伪乡长身份，滥施淫威，声称：“你们造反，我派人抓。你曹法孟带头闹事，是不想要命了。”为此伯父怒不可遏，毅然带领群众上告到县城。当时群情激愤，众怒难犯，国民党东明县党部，迫于广大群众的压力，不得不给伪乡长以应有的惩罚。这次斗争的胜利，大快民心，不但大长了革命群众的斗志，还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人与广大群众的联系。

随着形势的变化，遵照党的指示，伯父从一九三四年开始，以做生意为名，与本村曹法孔、张金堂、曹法吾等人，在南到开封，北至南乐，东起菏泽，西接浚县的广大区域内开展党的地下活动，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的道理，并发展党的组织，壮大革命队伍。当时，爷爷分家，伯父分得了二十亩土地，伯母准备把自己所积蓄的钱拿出来再置买些土地，让伯父在家耕种。伯父坚决反对说：“共产党要求改革旧的土地制度，使人人有饭吃，我不想当地主。”伯母听他说的有理，就把积蓄贡献出来，让伯父作为地下活动经费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芦沟桥事变后，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，国民党丧师失地，一溃千里，华北大片地区迅即沦陷。消息传出后，伯父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大声疾呼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“国难当头，岂能自守田园！”他东奔西跑，四处联络，在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，很快组建了东明县河西区救国会，会址设在我家南屋。王化山任救国会会长，伯父任组织委员。他们张贴标语，散发传单，组织训练抗日队伍，并在鲍占村举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，培训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二百多人，使我区的抗日战争迅速开展起来。

一九三八年初，河西区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二百多人，建立区级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。七月，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中国共产党东明县河西区委正式成立，王化山任区委书记，伯父任组织委员。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但国民党害怕人民的力量成长壮大，推行一条不发动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，还设置种种障碍，限制人民的救亡运动和共产党的活动，并阴谋利用日本侵略者的武力，妄图消灭人民的抗日武装。为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，一九三九年三月，中共东明县委组织部长王克敌到我区协助工作，由他兼任区委书记，伯父任区长并兼区队长等职。

重任在肩，伯父以公开区长的身份，积极开展党的工作。在王化山、张耀卿、鲍作梅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，伯父首先组建了拥有七十多人的区队武装，担任基本的自卫与抗日战争。接着在农村掀起了减租减息、捐大车等农民运动，以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，改善农民的生活，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。为支援抗日战争，伯父还带头出钱纳粮，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。当时伯父年过花甲，伯

父忙于区委工作，家中土地无人耕种，农忙季节求亲戚告邻居，打点粮食确实不容易，但是每次纳粮，伯父总是率先把自家的粮食贡献出来。为此，爷爷很心痛，且又想不通，儿子身为区长，不但没有薪金收入，反而带头出粮，于是年迈的爷爷到区部讲理。伯父则顾全大局，给爷爷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，与过去的官不一样，应该吃苦在前，享福在后的革命道理终于使爷爷想通了，全区的支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

中共东明县河西区委建立以后，东明县河西岸国共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明朗化。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，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，伯父率领区队主动出击。区委建立不久，根据情报，得知国民党丁树本部的一个连部，在邵儿寨驻扎。一天晚上，伯父带领区队员孙新得、王连冲等十二人夜袭敌营。他们在夜色掩护下，悄悄地来到敌人后院，迅速包围了敌连部。正在饮酒作乐、划拳行令的敌人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，刘天热等队员首先缴获了敌人的机枪。一顽敌抓枪企图抵抗，被伯父当场击毙。在“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”的口号震慑下，敌人一个个举手投降。这次战斗前后不到一个钟头，解除敌人一个连部武装，缴获机枪一挺，长短枪三十三支，子弹千余发，进一步武装了革命力量，鼓舞了人民群众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

为培养革命干部，一九三九年春，伯父邀请当时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，到我村党员会上宣讲革命道理。并选送我父曹法仲等十几名党员到濮阳沙木村参加由牛万里、鲍鸿阁领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。

一九三九年秋，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屠杀我无辜的

人民，实行惨无人道的“三光政策”，逐步缩小抗日根据地的面积。国民党反动派也为虎作伥，趁火打劫，进攻我抗日根据地。当时出卖、暗杀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的事件接连发生，一时整个东明黄河西岸，恶风骤起，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。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伯父把区队员化整为零，分散坚持革命斗争。

由于环境的不断恶化和生活条件的艰苦，不少区队员和个别区委干部，当了革命的逃兵，甚至变节投敌。但是，伯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，与敌人继续作不屈不挠的斗争。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：“我们就象淘金者手中的金子和沙子，在没有淘洗前，分不清沙子和金粒，只有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，剩下的才是闪闪发亮的金子。”不少队员在伯父的带领下，出没在黄河滩上，继续与敌人周旋。敌人到处搜捕，他们就夜宿黄河滩，渴饮黄河水，饥吃野菜草根。冬天就要到了，还没有棉衣穿，夜间的朔风吹得打颤，他们就几个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。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，他们不断袭击敌人据点，秘密召开会议，联络革命群众，神出鬼没，声东击西，使敌人胆战心惊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夜，伯父与区委其他领导同志王化山、刘肃、王子荣等人，在茅次庄王化山家中召开秘密会议。号称“老霸王”的张庄伪村长张廷贞，闻知后立即向敌人报信，伪连长牛风云等纠集上千人，团团包围了会场，妄图把我区队骨干力量一网打尽。伯父等得知后，沉着组织突围。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打破了黄河滩区寂静的夜空。伯父和区队员王连仲的两杆枪神出鬼没，弹无虚发，迅速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区队员全部冲出了王化山的家院。他们

边打边退，很快消逝在茫茫的黑夜中。这就是东明县河西区有名的“张庄事件”。

事件发生后，伯父来到濮阳渠村王本朝的区部居住。由于我县党的组织破坏严重，反动势力一时猖獗，王本朝区长劝说伯父暂时不要回家工作。伯父却说：“我是那里的区长，我不回去，那里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怎么工作，家乡的人民需要我啊！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嘛！”

农历七月二十九日，伯父带领区队的九位同志，悄悄来到我村召开党员会议，分析当时的形势，研究组织群众开展白区斗争的工作方法。深夜三点多钟，会议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继续进行。在外边放哨的区队员，也未发现可疑的行动。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在区队员进村时就碰到敌人的奸细曹喜龙。伪连长牛风云事先已与他暗中约好，伯父何时回家，便在村边的石榴树上挂红灯为号。家住村南二里左右的牛风云发现红灯后，连夜集合了反动武装二千多人，于天将亮之际包围了我三合村，伯父、刘肃、王子荣、孙新得、张辉卿、孙二毛、梁志祥和我父亲等八位同志不幸被捕。

敌人捉到了伯父和区委负责同志以后，简直欣喜若狂，得意忘形，发疯似的，要置他们于死地。敌人采取残暴的法西斯手段，对伯父等进行肉体摧残，用皮鞭抽还不算，竟要他们坐“老虎凳”，灌辣椒水，还用卑鄙下流的伎俩，引诱伯父交出我区党员名单。面对这些“衣冠禽兽”，伯父哈哈大笑说：“大丈夫为国捐躯，死而无憾！”敌人黔驴技穷，恼羞成怒，竟然用红缨枪刺穿伯父的颌下巴和肋，穿上铁丝三道，游街示众，借以恫吓群众，从牛庄到灰池，由武邱至罗圈，行程二十里，路过八个村庄，鲜血顺着铁丝淌向

全身，滴到家乡的沙地上，沙土变成了鲜红鲜红……伯父的鲜血洒在东明河西岸黄河滩的大地上。然而伯父并没有屈服，他大义凛然，怒斥顽敌：“你们这些民族败类，杀我一个，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。杀我一个头，你们几百个头也赔不起。”

八月初四，黄河滩上阴风四起，奔腾的河水，满载灾难和仇恨，咆哮旋转流向大海。黄河西岸的罗家村（今武邱乡南罗家村）东南的沙滩上，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，手持鬼头大刀，把伯父大卸八块，投入黄河。伯父高呼着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汉奸走狗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他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岁。

如今，伯父曾经洒下鲜血的黄河滩区，已成人民的天下。为纪念伯父英勇的革命业绩，一九四五年四月，滨县人民政府曾在孙庄集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“追悼曹法孟区长大会”。县委书记张泽民，县长郭涤生先后致悼词和讲话，并树碑一通，上刻“光照河滨”四个大字，下有碑文，记载伯父的革命事迹。这个高大石碑象伯父的高大身躯一样矗立在巍巍黄河大堤之上（现在移到县烈士陵园内），永远受到黄河儿女的尊敬和缅怀。

附：曹法孟烈士纪念碑碑文

光 照 河 滨

曹区长法孟，系滨河县第一区大曹家人。性倜傥，有大志，丰采奕奕，内信而外诚。年甫十三岁入学，则砥砺攻

苦，家居则操作知礼，共受私塾教育八年，高级小学肄业一年。此后旋里务农，闾里婚丧及一切公共要事，几无次不在掬诚竭力，是以附近群众爱戴非常。七七事变后，日寇席卷南侵，国民党统治下不抵抗之将军辈，无不风声鹤唳，抱头鼠窜；政府脏官亦无不置国家民族于度外，认为个人之头颅万不可轻言牺牲。于是午夜思维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捆载囊橐一变而为独行客矣。噫吁哦，我华北之大好山河不数月而沦陷敌手，千百万无辜同胞，弹指顷而践踏汤火，斯时举国沸腾，风云变色。曹区长目击敌人之虐我、仇我、杀我、烧我，不禁怒发冲冠，慷慨以国事自任。喟然叹曰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何人斯！蜗庐伏处。立即号召闾里，组织村救国会，继而参加区救国会。民国廿八年，在抗日政权领导下，升任东明县第七区抗日区长职。孰料灰池村郭润之、郭跃卿父子及张庄张廷贞等豺狼成性，觊觎为心，暗受投降妥协派、坏分子之唆使，竟敢冒民族败类，国家蠹贼之大不韪，不遗余力将落后群众组织为最反动之会团，执行其抗战者仇，迎敌者候的祸国殃民政策。促使黄河沿岸，一度变质，伊时造物者之鸟啼花落，水绿山青，亦无非爱国忠良之悲悼点缀。地危矣，事急矣！曹区长仍在赤心耿耿视死如归，风露转徙，饥渴顿踏，终以鱼游沸鼎燕巢飞幕，于是年六月间，与抗日县政府文教科员刘肃等四人，一并被郭跃卿等凶徒，捉获捆绑鞭打刀刺，鲜血淋漓。巨憨心犹未甘，又于七月初一日寸磔于南罗家村东沙地。时光逾载，又有祭城匪伪阎鸿玉跳梁河滨，社会骚动，闾闾惶恐。爱国志士刘幼林、杨受谦、王华山相继惨遭屠杀。光阴荏苒，转瞬六载，昔日之恶化地区，今已变为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匪伪阎鸿玉幸早毙命，而郭润之、郭跃

卿、张廷贞等残暴凶徒亦绝不容其逍遥法外，去年腊月则已将伊等正法。爰于今春发起全县追悼曹区长等大会，一壁表扬其艰苦卓绝，威武不屈之杀敌决心，一壁教育群众皂白分明，洞烛奸者，可认忠者足敬之大义，用特勒石纪念。

滨河县抗日县政府

县长郭涤生校阅

县参议王汉才书丹

民政科长田景韩敬撰

石工李福山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上浣谷旦

“浮丘店”村名小考

王 书 香

位于县城正北二十五华里处的丁栾乡浮丘店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。该村东北部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。遗址上出土的大量器物陶片表明，此处六千五百年前的母系氏族时期就已是一个村民点了。

浮丘店村现有二百六十余户，近一千二百口人。在村东北五十米处有一个二亩大的土丘，俗称高寺台。听一些老年人讲，早年的高寺台有二十多亩大，上有一座老奶庙，每逢上大水，全村人都跑到高寺台上躲避水患，被看作全村人的救命台。且有水涨台高之传说。当然是不真实的。不过就历次上水时的情景来看，在一片汪洋之中，高寺台土丘宛如漂浮在水面之上，又好象在水里浮着的一只葫芦，浮丘店与葫芦之村名便由此而得，至于此村名究竟起于何时，已很难考证了。

周宪章烈士事略

蔡国政 郑克家

周宪章烈士，字彬武，幼名祥坤。一九一七年四月出生于现在的河南省长垣县后周庄村（旧属滑县）。他生性豪爽，刚毅自重，素有胆识。父名周新更，勤劳俭朴，以农为业。母亲周于氏，以贤德闻名乡里。妻周陈氏，稳重大方，夫妇和睦。宪章烈士七岁入方里集初小读书，一九二八年入长垣县高小求学，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河南省立第五师范。这所学校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培养和发展进步学生，周宪章烈士于一九三四年四月，在此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他在读高小时，学习刻苦认真，思想进步，深受郭仪庵老师的赏识。读师范时，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但能按时完成老师所留下的作业，还十分关心国家大事，时常在深夜秘密阅读《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刊物，不断追求进步，寻求救国富民之道，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。他对军阀混战深恶痛绝，无限向往工农大众翻身解放早日到来。当时他曾在日记中写着“要想穷人不受欺，除非改朝换天地”的战斗口号！他向同学们说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，只要我们坚信党的领导，并积极投入革命战斗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成功！为实现这一伟大理想，他便秘密联合进步学生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预备队，分工暗地到街上贴标语，散传单，展开革命活动。他的这些活动，深受当时当地党组织的关注，

党组织认为他有组织能力，那一年五月，他受组织派遣，便退学回到滑县，在当地从事地下工作。当时和他取得联系的有尚子玉、郭卫人等，继之在高平一带建立了第一届党支部，尚子玉任支部书记，周宪章任组织委员，先后组织过“苦干队”，分头暗地到群众家宣传革命道理，为群众尽量办好事，因而深受群众爱戴和拥护。

一九三七年，他先后又和共产党员赵善交等取得了联系，活动更加频繁。当时豫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十分猖獗，周宪章同志等胆大心细，常出入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。由于当时环境十分恶劣，生活非常艰苦，尚子玉、周宪章、沈清章等同志便毁家纾难，慷慨解囊，资助革命同志坚持工作。

烈士的父亲唯恐儿子身遭不幸，曾劝儿子回家教书，宪章同志革命心切，将一切危险置之度外，仍然与敌整日周旋。老人为了拴住儿子的心，让他二十岁时便结婚。但婚后不几天，他又毅然奔出家门，夜以继日地坚持革命斗争，有一天，他回到家，父母硬要让他多住些天，他便劝父亲说：“我是个中国人，又这么年轻，不去为中国人的翻身解放出力，那还算是中国人吗！”他又劝母亲说：“干事好比小孩子学走路，摔倒了，再站起来，还是要继续走，老是怕摔着，那就一辈子也学不会走路！这样的人即是活到一百岁，那还不是个废人！难道我能在家白吃一辈子？”最后他写了一张条子，放到父亲床上，又毅然走出家门。

一九三八年九月，国民党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发现了“苦干队”组织的活动，妄图收缴“苦干队”的枪。由于寡不敌众，“苦干队”队长郭文甫同志只好将“苦干队”转移到陕甘

宁边区。临走时，让周宪章烈士留下继续坚持斗争。分别时，郭文甫同志两眼含泪，紧紧握住周宪章同志的手说：“待日后武装二次发展了，我再来接你到延安去。”

一九三八年十月间，赵紫阳同志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，并负责濮阳、东明、长垣、滑县党的发展工作，此时在高平建立了第四工委（下辖七个区）。当时滑县还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，日伪及国民党杂牌军队对老百姓百般刁难，阴云笼罩着豫北大地。为了坚持斗争并夺取胜利，赵紫阳同志便派周宪章、赵善交二同志打入敌伪联保处，不久便夺取了联保处的领导权。当时联保处在名义上是给国民党捐粮款、筹军饷，但实际上他们将所收粮款的一部分，暗地送给了八路军和中共滑县县委会，以供县委许多同志生活之用。

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间，日军侵占冀南、豫北。敌人在濮阳、东明、长垣、滑县四县不断搜捕共产党人，杀我同胞。二月七日，日军再次侵入长垣县城，一次就杀死无辜同胞一千七百余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赏学事件”。古历二月九日，日军又在濮阳杀害三百四十余人，接着又制造了“陈寨惨案”。古历二月二十八日，日军进攻滑县城，又枪杀我同胞达九百余人，继之敌人又进犯浚县。敌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，激起了人民对日军的仇恨。为击退敌人进犯，我豫北党组织，一面发动群众起来抗日，一面积积极开展对敌斗争，写标语，散传单，宣传好人要当兵、好铁要打钉，还教群众和学生唱革命歌曲。有些抗日歌曲至今仍有人会唱。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同时，还搞禁运工作，不准任何人到敌占区卖粮、卖棉花，坚决封锁敌占区。为了扩大革命队伍，赵紫阳同志在高平举办了“民训班”，培训抗日骨干，继之扩建救

国会。此时赵紫阳同志便派沈清章任余家一带救国会书记，周宪章任救国会长，协助赵紫阳同志在豫北开辟革命根据地。二人工作勤奋，常年在外，有时偶然探家，稍停即走。一九四〇年，国民党濮阳县专员丁树本，坚持反动立场，极力破坏国共合作，派便衣四处活动，搜集救国会活动的情报，在农历二月初八日，丁树本派人突然包围了高店村，软禁了正在那里工作的周、沈二同志。说是到此来“请贤”。丁对他俩说：“我很赞赏您二人的才干，才来请您二位的，我手下缺两个副团长，您俩跟我干，老兄决不亏待您们。”他俩听后哈哈大笑说：“副团长的官职可不小啊，可是破坏抗日，人民难容。日本杀了那么多的人，给他去办事，人民会骂娘的。”这句话可把丁树本气恼了，他气急败坏地嗯了一声说：“不想跟我走？那就太不识抬举了，那就请您俩享福吧！”然后，丁一挥手，走过来几个打手，将他俩逮捕了。接着就捆绑吊打，严刑逼供，要他俩交出救国会、共产党员名单来。他们坚贞不屈，字不吐，并大骂丁树本是人民叛徒。丁树本恼羞成怒，于二月初八日夜，将他俩拉到陈板城东南地一坑活埋了。他两人临死前，连声高呼：“共产党万岁！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！”敌人用枪托捣他们，用刺刀捅他们。他俩宁死不屈，仍然高喊着：“人民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清这笔血债的！”他俩壮烈牺牲时，周宪章年仅二十二岁，沈清章二十三岁。

滑县组织部长尚子玉同志闻讯后，立即在高平梁二庄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，首先追认周、沈二同志为革命烈士，并连夜召开了追悼会。然后布置了如何开展对敌斗争工作，他号召党员要团结一致，坚持斗争，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。散

会不久，不料尚子玉的地址又被丁树本派兵包围了，在农历二月初九日夜，他和许中兴同志在梁二庄又被敌人活埋了。尚子玉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岁，许中兴同志二十九岁。

周宪章同志壮烈牺牲后，土匪丁振印、李金奎、阎鸿玉等狗仗人势，曾三次到周家“清剿”，说周家还有个小孩，日后是个后患，要斩草除根。由于小孩被预先藏到外村，使他们未能找到，他们便勒令罚款一万银元，弄得周家家破人亡。后来，周、沈两家秘密将二位烈士的尸体分别运往家乡安葬了。烈士虽已离开人间，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豫北人民心中。

一九八二年“五一”节前夕，沈清章烈士的夫人赵大姐到北京看望他的弟弟赵紫阳总理时，赵总理还关切地询问周宪章烈士遗属的家庭近况。

（上接20页）

冀鲁豫、冀南各县。赵紫阳同志在一九四四年间对滨河县工作的指示中这样说过：“事实上滨河群众已逐步提高……，这次滨河民主运动是空前的。由于村干的活动，群众的酝酿，我们只作了一般的号召，由村干主持，这种方式是比较好的。”

滨河纪事

李庆云

万里黄河，经过长垣，滔滔流去。滨河县，这个在长垣大地上一闪即逝的名字，却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的光辉业绩。

小渠惨案时的党组织

小渠惨案是日寇在长垣犯下的滔天罪行。当时滨河县的党组织是如何活动的呢？

一九四四年日寇驻商丘的第四骑兵团，在太行山区吃了民兵的大亏，却疯狂扑向我冀鲁豫九分区。十月中，在上堤一带扫荡。十六日晚，滨河县（即长垣县）县委书记徐枫，接到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张国华的信：“估计敌人可能扫荡老岸、桑村、大堤以西三角地带。”见信后县委即把跑得快的人派出去送信，通知二、三区干部和附近民兵、村干部和老百姓撤离三角地带。但不少老百姓思想麻痹，不愿离开。对此县区干部整整折腾了一夜，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一直坚持到天亮，县委转移到神合庙。徐枫同志连自己的警卫员都派了出去。李聚堂同志下完通知离开小渠时已看到了两个骑大洋马的日本兵，由南向北沿大堤慢慢的行走。徐枫同志的爱人林萍同志撤离韩楼过大堤时，也和日本鬼子相遇。由于日寇这次采用的是麻痹战术，包围时不准放枪。所以和

他们遭害的干部才巧妙地越过大堤。县委书记命令所有干部向潍区大曹家一带转移，而徐枫自己带领警卫员李聚堂留下观察敌人的活动。

下午又是他们俩第一个进入小渠村，亲历了日寇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同胞的惨状，禁不住流下了悲愤的泪水。

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《冀鲁豫日报》第四版刊登了滨河县委书记徐枫同志给报社社长罗定枫同志的信，题目是《控告日本强盗的滔天罪行》。

信中说：

“报告你们一件事情吧，这件事情太残忍了！我们应该在报上发表，在边区父老面前，在中国同胞及全世界一切人士面前，控告那些杀人野兽，公布他们的罪行。

“小渠的大屠杀是多么的残忍你们知到吗？我是没法形容的，我觉得人类的语言和文字太有限了，‘残无人道’四个字太抽象了，太空洞了！我第一次到小渠的时候，是在敌人刚走后不到两个钟头，那时火还未熄，许多人还没死，已经有一部分群众回到小渠。同志，你看到过烧死的人吗？而且一片就是两三百，这真太残忍了，一个个都蜷着腿、捏着拳，不知他们在死前是多么难过哩。这里死的人一共有三片，还有一井。前小渠两片，每片都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左右，都用火烧了。后小渠一片没来得及用火烧，但已准备好麦秸和树枝。井里共有一百零五个人。到底杀了多少人呢？有一个同志查了一下，数目是六百二十多个，还有几十具尸体已被其家属领走了。据各村统计辛店最多是一百零四口，死绝男人的三十多家。一个张家胡同只剩下一个男人……尸体领了三天以后，我们区公所和部队又掩埋了七八十具。